

从档案到观念史

——回望中国现代设计的历程

■ 孙青

《1949—1979 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是沈榆先生两年前完成的著作，这是国内第一本以微观方式研究现代中国工业设计的学术专著，作者试图以实证的资料证明中国设计的客观存在。2017年，作者的《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出版，我作为这两本书的策划和责任编辑，可以说是见证了一个坚守学术信仰的中国设计研究者走过的艰辛及不平凡之路。

如果说《档案》一书是作者在创办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时，针对批量生产的中国工业产品而作的“考据”的话，那么《观念史》一书则是一部以反思为特征的深度研究之作。在《档案》中，我们看到作者试图将碎片化的中国设计史料复原；在《观念史》中，我们看到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新知识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正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才能得出如此有趣的观点。

在与作者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得知，上述成果仅仅是其中国现代设计十年研究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作者的理想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设计史，而且不是停留在描述史料、简单叙事的层面。作者曾多次表述，真理不在客观的史料中，也不在研究者的头脑中，而在两者的相遇过程之中。为此在他周边有一群研究社会学、经济学、技术哲学、现代思想史、人类学的学者，未来还将有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加入，各专业领域的知识将成为未来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的思想武器和思想资源。



《1949—1979 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
沈榆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在写作过程中研究许多不同领域的成果。如，在以中国现代设计史作为研究主体的同时关注了西方设计对中国的影响；在追问莫里斯工艺美术运动的本质时参看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专家的深入研究成果；在追问德国“理性设计”时查阅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由此找到了经典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观念史研究方面，研究了美国洛夫·乔伊

《存在的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学的研究》及中国美术学院曹意强教授等艺术观念史的研究成果；经济学方面，参考了同济大学符刚战教授有关宏观经济的研究成果以及《毛泽东选集》《陈云选集》中关于经济的政策性论述；建筑学方面，研究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士龄教授关于建筑批评的理论、译著及由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现代建筑》丛书；在哲学与技术哲学方面，主要查阅了维特

根斯坦《哲学研究》、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库恩《科学革命的范导》、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及中国科学院系统相关专家写的技术哲学著作和纯技术史文献。作者将中国现代设计史料嵌入到一段真实的历史发展背景中去研究，避免只是简单分析归纳史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观念史》是极具突破性的。

当代中国设计高速发展，扑面而来的新技术、新思潮让我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回眸历史。热闹的论坛、讲座聚焦的还是局限在技术与操作方法层面的知识，至于设计的批判实属一个遥远的彼岸，对于中国设计发展的展望也往往从概念、技术出发进行预测，不仅没有能够发现新的知识，得出的结论还十分幼稚。

相对而言，建筑史、科学史、技术史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特别是近年来以海归为核心力量的研究成果让人振奋，教学也形成了建制，建筑批判在中国高校建筑专业中已是一门必修的课程。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的话“科学史是沟通旧人文和新技术的桥梁”也许能帮助我们认识设计史研究的意义，设计史是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建构中国现代设计发展历史，其目的在于反思、批判，而不是怀旧。首先要将近百年伴随着现代化发展的设计史还原为一段可触摸的历史，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有十分漫长的过程，为此作者设计了研究路径，而《观念史》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一书的序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助理、《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教授撰写，他曾建议作者学习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解读”与“解释”正是社会学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方法。所谓“解读”是理清资料、归纳现象，用逻辑推导出结论，其核心是归纳，所以比较容易得出一些标签式的关键词和描述；所谓“解释”是以比较为基础，通过研究对象周边相关资料，通过构建语境来得出模型，用于批判和反思。在中国设计史的研究中，沈榆教授往往是两种方法并举，同时引入经济学、技术发展史等相关知识，工作量无疑呈平方级数增加，同时还增加了风险。

沈榆教授坦言，无论是创办博物馆还是写作都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期待中国设计能够超越自我走向未来，而对自身发展历史的梳理则是这种超越的起点。一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所言：历史发展并非是“过去——现在——未来”一种线性模式，而是三者的互动模式。换言之立足现在，遥望过去，可以预测未来。

(上接第一版)

英国文学在上海的传播源远流长

上海具有海纳百川的历史传统。自晚清以来，上海开风气之先，成为融汇中外文明的枢纽。随着上海的开埠，英国文化在上海都市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文学传播赖以生存的新闻出版方面，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著名的出版印刷机构与报刊，如上海最早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1843年)，第一份中文综合性刊物《六合丛谈》(1857年)，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年)，以及发行时间最长的两大名报，即西文的《字林西报》(前身是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中文的《申报》(1872年)，对上海的近代媒体发展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申报》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重镇，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为人文荟萃的上海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有力地促进了外国文学的译介，为中国的新文学成长输送了丰富的养料。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集聚了我国优秀的翻译与编辑群体，以报刊和图书为媒介，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此纷纷发表，占据了我国翻译出版的半壁江山。因此，在上海优越的历史条件下，英国文学翻译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文化环境，在上海风生水起，文学作品的在华译介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国翻译出版英国文学的主要中心，在英国文



《听夕闲谈》首期书影(《瀛寰琐记》第三卷 一八七三年一月)

译文：《谈瀛小录》《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的

学的推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有资料表明，我国近代外国小说的翻译发轫于英国小说，始见于上海的报刊。如1872年5月21日至24日的《申报》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的译文，约五千字，名为《谈瀛小录》；1872年5月31日起分六期刊登的《乃苏国奇遇》是英国小说家马利亚特的《听很多故事的把沙》中的《希腊奴隶的故事》的译文。1873年1月，申报馆出版的《瀛寰琐记》第三期上发表了我国近代第一部汉译小说《听夕闲谈》，共连载26期，约30万字。其译者蠡勺居士的本名考证目前尚有争议。时过百年，经美国汉学家韩南研究，此书原著是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所作的《夜与昼》。2000年，韩南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讲座中公布了这项重要发现。以上汉译文献和英文原著在上海图书馆均有实物收藏，见证了英国文学在上海的早期传

播历史。

上海成为英国文学出版的重镇

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许多期刊不仅辟出专栏发表译作，还出版了多种翻译专号或纪念专号、专栏，以英国作家数量居多。如《创造季刊》(1923年9月10日1卷4期)的“雪莱纪念号”，《小说月刊》(1924年4月10日15卷4期)的“拜伦专辑”，《现代》(1932年12月1日2卷2期)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译文》(1937年3月16日1卷1期)的“迭更司特辑”，《新演剧》(1937年6月5日1卷1期)的“莎士比亚特辑”等。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为代表的上海出版机构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研究者统计，1911—1949年我国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有739种，大多出版于上海。如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十

分重视翻译作品，出版了大量文学译作，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作主要在商务刊行，他的《林译小说》丛书两集共100种，其中英国文学多达68种。当时的许多文学译作丛书为中国读者传递了丰富多彩的英国文学。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总目》中著名译文书为例，英国文学作品数量居于前茅，如商务印书馆1928年4月至1950年2月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共154种，其中英国28种；启明书局1931年8月至1949年5月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共78种，其中英国22种；中华书局1939年8月至1947年10月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学丛书》共8种，英国占了7种；世界书局1931年10月至1937年3月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库》共编号47种(缺7种)，英国13种。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统计，我国大陆地区在此30年间翻译出版了47个国家276位作家的1250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在上海出版的就有710种，占全国的半数以上，其中英国文学仍有较高的比例。上海的英国文学作品译作出版遍及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等类型，1949年后的上海多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众多从古典到当代的英国文学译作，其中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规模领先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所出版的名家名译佳作，享誉海内外。

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名家名作，群星璀璨。上海在近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兼收并蓄，广泛译介英国的文学作品，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